

论东汉宦官在教育科学文化领域的贡献

范宇飞¹

(¹ 渤海大学, 辽宁 锦州 121013)

摘要: 东汉时期, 宦官是当时教育、科学、文化发展的参与力量之一。在教育革新方面, 宦官推动建立的“鸿都门学”突破了汉代以儒家经学为单一教育内容的传统框架, 开创了注重文学艺术研究的新学风, 同时“养子”制也促使教育资源再分配; 在科学领域的贡献集中于他们在技术革新、工艺传播和科学实践中的作用; 在文化领域宦官通过直接参与或间接举荐的方式参与到文化事业中。这些成就的取得, 既得益于皇权的特殊庇护, 也源于部分宦官自身的文化修养以及在政治博弈中的特殊地位。尽管其政治角色备受争议, 但是他们在该时期的贡献不应该被忽视。

关键词: 东汉宦官; 汉代科技; 鸿都门学

On the contributions of Eastern Han Eunuchs to the Fields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Culture

Fan Yufei¹

(¹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Liaoning Province, 121013)

Abstract: During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eunuchs were one of the participating for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culture.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 the Hongdu Men Academy, established under the promotion of eunuchs, broke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framework of Confucian classics as the sole educational content in the Han Dynasty, initiating a new academic trend that emphasized literary and artistic stud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adoption of sons" system facilitated the re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eir contributions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we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ir role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raft dissemination, and scientific practice. In the cultural sphere, eunuchs participated in cultural endeavors either through direct involvement or indirect recommendations. These achievements were made possible both by the special patronage of imperial power and the cultural cultivation of some eunuchs, as well as their unique status in political struggles. Although their political roles have been highly controversial, their contributions during this period should not be ignored.

Keywords: Eastern Han Eunuchs; Han Dynas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du Gate Academy

引言

回溯东汉历史, 宦官群体不仅是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更是当时教育、科技与文化事业发展不可忽视的参与者。与过去关注东汉宦官在政治上的负面形象不同, 葛承雍的《不应一概贬低东汉宦官》一文中指出对于宦官“贬斥太过”^[1];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提及“宦官亦有贤者”^[2]。为此, 华青《论秦汉宦官在科技文化领域的贡献》、王永平《东汉后期之宦官与社会文化变迁》中皆提及了宦官的贡献, 但尚有可继续发掘的空间, 故本文在学界既有研究基础上对此问题进行考述:

1. 东汉宦官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发展的表现

1.1 东汉宦官在教育领域的贡献

东汉灵帝时期所设立的鸿都门学, 对“独尊儒术”的汉代产生了巨大冲击, 同时也为后来因

作者简介: 范宇飞 (1998—), 男, 四川南充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史研究。

科举而设的各类专科学校开辟了道路。在桓帝、灵帝时期，东汉思想文化较之于前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汉灵帝本人也爱好文学、书法，亲自编撰《皇羲篇》。汉灵帝召集了一批擅长写诗作文的儒生，他们靠奇技淫巧讨好皇帝^[3]这引得正统官员的不满与反对，反而使灵帝下定决心正式办学。鸿都门学的设置虽然表面上是皇帝出于自身爱好所设并公然跃出传统儒学取士而采取文学艺术取士，实质上是失权皇帝借助宦官力量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

汉灵帝于东汉光和元年（178年）创立“鸿都门学”，王永平先生认为：处于政治、文化边缘的才艺之士，他们进入鸿都门学，以才艺作为选拔标准，成为宦官集团的政治附庸，以达到取替太学的目的。^[4]由于灵帝的支持，鸿都士人逐渐增多，使得汉末宫廷中文学艺术之风盛行。从蔡邕、阳球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抨击鸿都门学、指责其学生出身“出于微蔑，斗筭小人”、认为他们作品“连偶俗语，有类俳优”，这些激烈的反应恰好证明了鸿都门学对儒家正统的冲击。

鸿都门学的设立冲击以儒家经学为唯一教育内容的旧观念，以“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作为选拔核心，倡导研究文学艺术，突出其他文学艺术形式的教育方式，开创了官办专科教育的先河，是对教育的一大贡献。同时，鸿都门学所招收大部分学生并非依靠家族经学背景和道德声望，使非经学世家出生、拥有文艺才能的士人也能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

宦官还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再分配。马小方先生认为：在“家学”盛行的东汉，家学成为经学、自然科学传播的主要途径^[5]。经学在一家一姓中传播，文化上的垄断导致政治仕途上的垄断。在东汉中后期，宦官集团通过“养子”制度，客观上为文化资源的流动开辟了一条特殊的非血缘的途径。例如十常侍之一张让收养太学生、大长秋曹腾收养曹嵩等。赵沛先生认为：“豪族世家占据统治地位的东汉朝，养子制标志着宦官集团可以以家族的身份出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6]“养子”制的形成既包含了政治联盟的需要，也暗含了文化传递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经学世族对经学“家传”的绝对垄断，形成了一条有别于传统经学传承和政治继承模式。

1.2 东汉宦官在科学领域的贡献

东汉宦官在科学领域的贡献虽然多是服务于皇权、借此提高个人权势的行为，但是仍然不能否认他们在技术革新、工艺传播和科学实践中的作用。其中最为突出的贡献者当属汉和帝时期的宦官蔡伦。据《后汉书·宦者列传》载：“永元九年，（蔡伦）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7]蔡伦担任尚方令时，所监造刀剑器械质量非常高，成为后世典范，体现了其在技术革新方面的卓越能力。周金华先生认为：武器的精良与否，关系着战争结局和战士生死存亡。蔡伦正是因为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会做到“亲躬”，造出来的兵器才“莫不精工坚密”“牢劲精利”。^[8]“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9]蔡伦这种深入田野、积极投身的行为，为他日后进行工艺突破奠定实践基础。

蔡伦在技术革新上又一成就是改进造纸术。据《后汉书·宦者列传》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10]蔡伦对造纸术的技术革新不仅成就了他个人使之被封为侯，其所献纸得到汉和帝欣赏并为全国推广使用。自此，轻薄便宜易携带的纸张得以推广应用，逐渐取代了沉重且昂贵的简帛，极大降低了文化与工艺传播成本，推动了教育、文化事业发展。

除了蔡伦之外，宦官在科学实践方面同样成就卓著。汉灵帝时期的宦者毕岚因其为讨好皇帝所作机械发明，却意外造福了后世百姓。据《后汉书·宦者列传》载毕岚担任掖廷令，负责汉宫的建筑修缮、园艺等工作，他所作“天禄蝦蟆”、“翻车渴乌”等机器发明高效便捷^[11]。虽然这些科技发明服务于皇家奢靡生活，但其发明与应用本身即是一次重要的技术革新。例如毕岚所奉命制造“翻车渴乌”，用于灌溉宫廷园林，封五昌先生认为：这是翻车见于史籍之始，所以毕岚被认为是翻车的创始者^[12]。尽管当时被批评为劳民伤财之举，但客观上为中国古代农业技术的演进提供了实践参照。

1.3 东汉宦官在文化领域的贡献

东汉儒学大兴，太学林立，学术气氛浓厚，故而东汉在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和文化发展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在这一文化繁荣的进程中，部分宦官依靠自身学识或举荐人才，直接或间接地为推动东汉文化领域的繁荣中做出过一定贡献。

蔡伦、李巡等宦官，凭借自身的学术素养，为维护东汉儒家文化的传承与正统性，做出了积极的、不容忽视的贡献。蔡伦于永初四年（110年）主持了典籍校订工作，有效纠正了当时儒家典籍“文多不正定”等现象^[13]，清人赵翼赞誉他为“汉宦官之贤者”^[14]。灵帝时期，李巡也同样展示了其学术担当。李巡发现了诸博士在监考甲乙科中，出现了舞弊、漏题行为，甚至有贿赂掌管典籍的官员在书籍文献上做改动，将自己的文章写于文献之上以做圣贤之语，于是李巡上陈灵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自《五经》校定后，争斗声便销声匿迹了^[15]，由此可见李巡的学识与修养。此外，灵帝时宦官上书陈时弊，能多引用《周易》等儒家经典，从侧面体现宦官文化素养的提升。这些拥有较高学术素养的宦官适时地向皇帝提出校订儒家经典、引用儒家经典进谏等行为，推动东汉文化事业的规范与发展。

东汉宦官还通过举荐名士，间接推动东汉文化事业的发展。《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曹腾）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溪典等。”、种皓位居三公之一的司徒后对众宾客说：“今身为公，乃曹常侍力焉。”^[16]曹腾身为宦官，推荐众多名士入仕，这与东汉后期宦官“残害忠良”的负面形象不同。曹腾推举的名士“皆致位公卿”，且对东汉文化颇有建树，例如边韶著诗、颂、碑、铭、书、策共十五篇，堂溪典参与“熹平经刻”等，均为东汉文化事业的繁荣注入力量。

2. 东汉宦官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发展原因探析

2.1 皇室的支持

东汉皇室对于宦官的支持在其推动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东汉对于文化的重视始于光武帝。刘秀兴建太学，立五经博士，鼓励私学。也是光武帝在位时期，光武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故“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使得宦官得以在东汉中期发展成为“手握王爵，口含天宪，”^[17]的群体。两者在时间线上重合，宦官逐渐受到东汉皇室的重视，为后来宦官在教育、科学、文化领域做出贡献创造条件。

在刘秀决定“偃武修文”后，许多人开始重拾旧业，“敦习儒学，”豪强开始士族化^[18]，家学教育开始兴盛。这些士族的子弟与皇族的联姻，使得东汉政府更为重视文化、科技、教育的发展。其中和熹皇后邓绥对于蔡伦的支持最为突出，刘光欲先生认为：“宦官蔡伦搞发明创造不能没有支持，东汉宫廷里有蔡伦的得力支持者，就是和帝，特别是邓皇后”^[19]。据《后汉纪·和帝纪》载：永元十四年（102年）邓皇后下令禁止上贡珠玉宝物，每年能够上贡只能上贡纸（绢素古纸）墨。^[20]邓绥支持蔡伦改进造纸术并提供资质，时常过问蔡伦相关工作进展。元兴元年（105年），“蔡侯纸”问世标志着蔡伦对于造纸术的改造得以成功。邓绥作为皇后以身作则，在汉廷中使用、推广“蔡侯纸”，邓皇后的行为使得纸在东汉上层社会受到关注并推广开来。蔡伦能够改进造纸术除了自身的技巧外，与汉和帝、邓皇后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不仅如此，皇权还通过授予宦官文化事务管理权，使其深度介入到国家文化事业。蔡伦、李巡等宦官被委以校对儒家经典的重任，既体现了皇室对文化典籍整理的重视，也暴露出利用宦官监视士大夫的政治意图。灵帝对于宦官的支持还体现在鸿都门学的建立上，王永平先生认为：虽然鸿都门学的设立与宦官集团势力膨胀密切相关，但是灵帝出于对文学、书法的爱好以及对抗豪门士族集团控制下的太学从而支持宦官集团也不无关系。^[21]皇帝与宦官联手，试图绕过士族控制的传统教育体系，另建一个忠于皇权的文化与官僚阵地。

2.2 自身的文化程度

东汉宦官自身的文化水平是其推动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基础。对于东汉宦官集团的文化特征及其文化取向，谢名会先生在对东汉宦官籍贯分布特点和现象的影响因素分析时提到：“东汉的宦官需要辅佐皇帝，且需要跟外戚集团进行权力上的斗争，因此东汉的宦官多是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22]例如《后汉书》评价蔡伦：“伦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23]反映出蔡伦不仅拥有学识，更有以文化素养参与政教事务。灵帝时期，李巡看不惯儒家士大夫为了一较高下而不择手段，于是自荐去改变现状，起码在这一点上他的精神比当时绝大多数的士人正直，是有学识、修养的宦者。

从《后汉书》上看，宦官一部分是具有一定知识和权谋，例如吴伉“善为风角，博达有奉公称”、

侯览“颇识典物”等。这些宦官往往凭借其知识素养与权谋智慧在宫廷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一现象表明，宦官凭借自身文化素养，将其活动范围延伸至国家政务、科学文化等诸多层面，对东汉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广泛而产生深远影响。

2.3 政治斗争的间接影响

政治斗争是东汉宦官促进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宦官参与到政治斗争中是东汉政局的一大特点。东汉初期政治较为清明，皇帝个人品质较高，所以宦官擅权的局面没有出现，但是光武帝“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24]使得宦者队伍不断壮大，为宦官势力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自和帝以后，宦官集团不断参与到与外戚集团、士大夫集团的斗争当中，直到桓、灵二帝时期宦者势力达到顶峰。在宦官集团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皇帝和以后妃为核心的外戚集团都起到推动作用，宦官集团因其近侍内廷的原因受到重用，宦者因此得以手握权力进而推动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发展。

宦官在政治斗争中间接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在汉灵帝时期最为突出。在宦官集团的强力鼓动和支持下，汉灵帝不顾朝臣反对设立鸿都门学，其目的就是为了对抗士族。尽管其设立的初衷是政治斗阵，但鸿都门学的成立打破了儒家经学对高等教育的垄断，极大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

三、宦官推动的教育科学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

东汉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科技成果，宦官或多或少地参与到其中。东汉经学的繁荣是一代代经学大家的成果集合而成，在这之中也能发现如蔡伦、李巡等宦者的助力，他们对儒家经典文书的校订和整合使之得以规范，一些宦官甚至“选贤任能”推举名士入仕，这些行为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士人仕途乃至国家文化事业发展，在文献校勘史与传播史、文化传承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鸿都门学的设立开辟了除儒经取士的其他形式的取士方式，突破了“独尊儒术”政策的藩篱，为艺术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为后来特别是唐代的科举和设立各种专科学校提供了借鉴。而以蔡伦“造纸术”为主的宦官主持的科学技术发明，展示了他们在技术革新、工艺传播和科学实践中的作用，推动社会生产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发展。

东汉宦官在教育、科技、文化领域的贡献，客观上推动了汉代社会的知识结构多元化、科技实用化以及文化世俗化。尽管其政治角色备受争议，但是他们在以上领域贡献不应该被忽视。

参考文献：

- [1] 葛承雍.不应一概贬斥东汉宦官[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03):79-85.
- [2] 赵翼:《廿二史劄记校证》卷四《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25页。
- [3] 《后汉书》卷六〇《蔡邕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740页。
- [4] 王永平.汉灵帝之置“鸿都门学”及其原因考论[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05):11-17.
- [5] 马小方.两汉家学研究[D].山东大学，2006年。
- [6] 赵沛.传统宗法文化与宦官养子袭爵之风[J].廊坊师专学报,1994,(01):16-20
- [7]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523页。
- [8] 周金华.试论蔡伦的科学精神[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8(04):68-70+86.
- [9]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523页。
- [10]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534页。
- [11]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498页。
- [12] 封五昌.毕岚始作翻车[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04):62.
- [13]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543页。
- [14] 赵翼:《廿二史劄记校证》卷四《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25页。

- [15]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533页。
- [16]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519页。
- [17]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2页。
- [18] 孙腾达.东汉初年军功阶层研究[D].渤海大学,2014.
- [19] 刘光裕.发明家蔡伦生平事迹考[J].齐鲁学刊,2000,(04):104-107.
- [20] 《后汉书》卷四《和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66页。
- [21] 王永平.东汉中后期之宦官与社会文化变迁[J].江海学刊,2007,(02):150-157.
- [22] 谢名会.浅析东汉宦官籍贯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原因[J].西部学刊,2021,(24):122-125.
- [23]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533页。
- [24]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2页。